

“一般智力”资本化视域下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消解与重塑

冯威然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4日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马克思“一般智力”在数智时代物化的最新形式, 其在资本私有制框架下转变为数智固定资本与统治活劳动的“死知识”, 它在以下三方面隐蔽地消解着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一是在所有制层面数字资本通过相关基础设施垄断并剥夺社会整体智慧结晶; 二是在劳动能力层面它引发了劳动者去技能化与认知退化; 三是在社会结构层面, 全球数字分工加剧了数智阶层固化。为了在当代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的重塑, 应当推进所有制变革与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共享, 实现这种智慧结晶的社会化复归; 同时构建超出资本逻辑控制的认知正义机制以促进人的劳动能力同数字化趋势相适应; 最后通过社会分工的重组与促进无产阶级的新型政治联合来重塑阶级结构, 最终将人工智能转化为确证人类本质力量的社会化的一般智力, 以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推动向自由王国迈进。

关键词

马克思, 一般智力, 人工智能, 资本化, 劳动者主体地位

The Dissolution and Reshaping of Laborers' Subjective Status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ization of "General Intellect"

Weiran Feng

Institute of Foreign Marxism,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ly 12,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As the latest form of objectification of Marx's "general intellec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s into digital-intelligent fixed capital and "dead knowledge" that dominates living labo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 It covertly dissolves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laborers in three dimensions: first, at the level of ownership, digital oligarchs depriv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ocial wisdom through infrastructure monopoly and recursive data capture; second, at the level of labor capacity, it triggers deskilling and cognitive degradation; third, at the level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global digital division of labor intensifies digital-intelligent stratification. To reshape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laborer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dvance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and open-source sharing to realize the socialized return of the crystallization of wisdom. Furthermore,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cognitive justice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reconstruct labor capacity, and class status should be reshaped by reorganizing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alliance between mental and manual proletariats. Ultimate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 socialized general intellect that confirms human essential forces, driving the transition toward the "realm of freedom" with free time as the true measure of wealth.

Keywords

Marx, General Intell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pitalization, Subjective Status of Labore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关于“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西方学界称为“机器论片断”,下文简称片断)一节中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 pp. 91~98)国内外学界目前已围绕一般智力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国外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解读路径:以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主体政治解读路径、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和左翼加速主义为代表的客体技术解读路径,是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路径[2]。

针对西方左翼学者的上述观点,国内学者则主要侧重于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方法来揭示他们的理论得失。虽然国内学者的理论努力为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厘清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得失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目前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批判西方学者的层面上,尚未重新回答西方学者所论及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问题。本文试图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推进至当代数智资本主义腹地,系统剖析作为当代“一般智力”的最新对象化成果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消解机理。在此基础上从所有制变革、人机协同的认知正义以及无产阶级新型政治联合等层面,探寻人工智能向社会化复归的治理路径,以期实现数智时代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现实重塑。

2. “一般智力”的理论实质与其资本化历史演进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智力在当代物化的最新形式，尤其是诸如 Claude、ChatGPT、Gemini 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正重塑着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范式和劳动方式，自然也重塑了人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的内容和形式，并由此投射到“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直观自身”的环节中，进而影响人如何“真正地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而人作为以劳动为“生活第一个基本条件”的存在物，当下的科学技术变革向哲学抛出的核心问题就被进一步概括为：作为当代“一般智力”最新物质载体的人工智能，究竟如何影响、重塑乃至解构着人作为“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与主体地位？回应这一时代命题的首要理论前提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对“一般智力”这一核心范畴展开文本学考证与历史脉络梳理。

2.1. “一般智力”的理论实质

诚如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维尔诺(Paolo Virno)所言，“‘General intellect’这一来历不明的英文表达，可能是对卢梭‘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反驳，或者是对 nous poietikos 即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讨论的客观独立的‘主动理智’(active intellect)的一种唯物主义模仿。”[3]由此观之，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的来历的确扑朔迷离。在孙乐强看来，韦塞隆(Carlo Vercellone)就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解释。韦塞隆指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论述霍吉斯金的那部分中，我们发现了一般智力的最初雏形……虽然马克思强调，霍吉斯金关于资本的非生产性的论述‘有点低估了过去劳动对于现在劳动的意义’，但是他关于主观条件(技能和知识)比客观条件重要的断言，无疑影响了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意义和作用的阐述。”

孙乐强还指出，不论是维尔诺还是韦塞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即工艺学。他注意到在 1827 年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之后，从工艺学角度探讨科学技术知识在工厂中应用的著作，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和尤尔的《工厂哲学》(1835)开始高频次出现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著作之中。回归“片断”本身，两者的著作论述也为马克思在“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一节开篇引用。此外，尤尔认为，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工厂体系将越来越趋于自动化，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劳动，而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一般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这一观点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在现代生产中作用的认识。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1], p. 9)工艺学的思想史考察虽仅为一种可能的词源探索，但它无疑表明在讨论看似客观中立的“一般智力”时，必须注意将其置于以工厂大工业生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廓清其与“片断”之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固定资本”的具体联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固定资本严格限定为一种基于资本价值周转和流通方式(而非剩余价值生产)的外在划分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4], p. 177)固定资本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在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上的区别从一种形式上的量的分割转化为在物质存在形态上质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有到了这时，“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5], p. 188)。这表明固定资本向来不是亘古就有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遵循这样的思路再回归“片断”的标志性论述，马克思在指认一般社会知识时使用了德语“allgemeine gesellschaftliche Wissen”，紧随其后又对其标注了英文“general intellect”(一般智力)。单从语法递进来

看,后半句的“这种智力”所指向和指代的就是前半句的“一般社会知识”。由此观之,一般智力在内容形态上正是“知识”,这样的知识是先于固定资本存在还是与其相伴相生呢?事实上,在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形成之前,一般智力就已经作为人脑和自身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历时态地存在了。马克思通过摘录波珀(J.H.M. Poppe)、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在前资本主义的手工生产阶段,一般智力本身与劳动直接结合,其表现为劳动者自身的内在素养与整全技巧[2]。正如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1], p. 357)

然而,生产力的跃升与社会大分工催化了脱产阶级,客观上孕育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分离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确立,活劳动与一般智力的本真结合最终彻底走向分离。“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5], p. 418)总之,一般智力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属产物,而是全社会世代累积的普遍科学技术力量。但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抽象的“活知识”必然通过活劳动作用于具体的“固定资本”,在对抗性的形式规定(Formbestimmtheit)中演变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即构成了“一般智力的资本化”。

2.2. “一般智力”的资本化历史时态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5], p. 922)“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活劳动吮吸得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5], p. 269)“一般智力”的资本化就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货币与商品一般,经历了一个从“活的社会关系”向“死的客观之物”的物化与异化转变。商品与货币之所以产生拜物教的幻象,根源于私人劳动向抽象社会劳动的历史分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感性上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一拜物教逻辑同样深刻地支配着一般智力的历史命运。

这一历史分离过程首先始于一般智力的物化(Versachlichung)。物化本身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实践的自然结果,人类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必然将自身的普遍经验与科学知识对象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确立分散的独立劳动者强行纳入统一的作坊与工场之中。曾经劳动者们独立分散的知识积累与协作经验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的形式规定性(Formbestimmtheit)倒因为果,本应属于社会共同体的“一般智力”,如力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虽然其现实应用于生产之中仍有赖于劳动者,但它在形式上已同资本联系紧密,继而转变为服务于资本增值的“一般智力”。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1], p. 366)资本主义由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高度依附于这种狭隘的技术分工与局部经验,导致“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5], p. 393),这逼迫着一般智力抛弃主观技能的外衣,向历史更深处演进。

也就是说,一般智力的物化最终必然走向一般智力的异化(Entfremdung),社会普遍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再存在于具体工人的意识或技巧中,而是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内在属性,并获得了它最适当的物质存在形态——自动机器体系。当一般智力通过资本化彻底取得了独立于活劳动的自在存在形式后,机器体系作为“死劳动”凝结反而代替了其创造者和操纵者,这个由人类大脑所创造出来的“对象化知识力量”,非但没有成为促进减轻人类劳动的强度和主体解放,反而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转过头来统治其创造者。被资本化了的一般智力在内容上是整个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实践、共同协作的精神结晶,但在形式规定上却囿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固定资本体系绑定,最终演变为一种压迫活劳动、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死知识”。

3.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智力”资本化的新型形态

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般智力”最普遍的资本化形式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控制的自动化机器大工业体系；那么在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社会普遍知识的结晶则演变为了无实体物质形式且具备自我迭代能力的数智化固定资本，它们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且向大众免费开放。这种看似普惠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不仅是这种一般智力载体的资本化本质，反而以一种更具隐蔽性和渗透性的方式全面重构着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方式与并固化着原有的阶级关系。

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 p. 210)正如大工业时代以自动化机器体系为代表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历史性地超越了早期“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一样，人工智能作为数智时代劳动资料的核心，正在实现社会普遍知识形态的客体化跃升。这一新型生产工具不仅确证了生产力在技术构成上的质变，更能够进一步“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严重依赖于厂房、设备与原材料等有形物质构成的实体固定资本投入，而当代智能机器体系则呈现出“知识构成”在系统内部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全新特征。知识构成比例的激增，使得自动化技术、算法模型等一般智力成果一经创生，便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部署。近年来，以 ChatGPT, Claude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性价比上不断实现跨越，推理与调用成本更是呈现出断崖式下跌[6]。这一现实案例生动地证明，当代智能化机器体系的生产力飞跃，已不再单纯依赖有形物质成本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算法的迅速迭代与算力模型的深度优化，在更高层次上完成了对人类普遍社会知识的对象化吸纳。这种客体形态的转变，使人工智能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机械自动机阶段，而且在现实层面架起了连接人类自然智能与机器物质智能的桥梁。它打破了传统的物我分明的经典世界观[7]，使原本被视为专属于人类主体的“智能”现象突破了生物载体的限制，被重新封装进私有化的算法黑箱与云端网络之中，转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为存在的资本化“死知识”。

这种资本化“死知识”，即人工智能作为“一般智力”在数智时代的最适当物质载体，它在结构上实现了物质形态、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三重整合：其一，物质形态表现为由超级算力集群、云基础设施以及作为执行末梢的智能终端所构成的“总自动机网络”，这是死知识在空间上借以发生作用的物理载体。其二，技术形态则内嵌于劳动者在智能化协同生产中不断涌现的数据生成、模型调整及工艺规范中，将传统的代际经验与组织协作转化为可编码、可复制的技术模块。其三，知识形态则广泛整合了由专业研发精英产出的专家科学知识，以及广大普通用户在日常网络行为中所沉淀的海量行为数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5], p. 212)

而在资本的形式规定下，有形的固定资本(如机床)在闲置或停止操作时往往是静止且内耗的，它本身并不具备主动调用外部活劳动经验以实现自身进化的动机。与之相反，现代人工智能系统则通过以上三重整合建立在“生产-反馈-再生产”的动态循环生产过程之中[8]。无论是何种层级的劳动者或普通用户，在每一次调用 AI 大模型、输入提示词指令、展开结对编程，或是调取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其行为轨迹、逻辑习惯与语意倾向都在无意识地被系统转化为宝贵的训练数据。

可以说，数智资本表面上看似为全社会提供了普惠便利的智能平台，实则在后端无偿获取了饱含活劳动主体特征的高价值数据资产。马克思曾精辟地断言：“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5], p. 444)在数智时代，这种死知识对全社会活知识的高效吸纳，使资本的剥削路径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资本主义不再仅仅专注于传统工厂车间或现实土地的显性掠夺，而是全面转向了对社会生活进行全天候、立体式剥削的“隐性萃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主客关系的进一步颠倒，整个人类社会的认知交往时空最终被改造成成了一个跨越物理边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转的“全球算法社会工厂”。

4. 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消解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深层机理

当“一般智力”在当代资本主义形式规定下客体化为人工智能这一数智生产资料时，它不仅表征着技术范式的飞跃，更是重构数智时代社会分工、阶级结构与剥削路径的客体化中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在于穿透技术中立主义的面纱，剖析数智资本控制劳动的内在机理。本章将从宏观所有制关系、微观劳动过程以及全球分工结构三个维度，系统阐释资本逻辑利用人工智能剥夺劳动者智慧结晶、消解劳动者劳动能力并重塑阶级秩序的深层机理。

4.1. 对劳动者智慧结晶的剥夺：资本占有与数字地租

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消解，首要表现在所有制层面对社会劳动者共同智慧结晶的私人占有与圈禁。在数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构型中，垄断数字寡头凭借对超级算力集群、云基础设施及通用大模型底座等“云资本”的私人占有，构成了绝对支配者。垄断资本通过修筑知识产权壁垒、控制底层 API 接口、垄断通用技术标准，将属于人类公共协作、历时态积累的“一般智力”成果强行收归私有，从所有制源头上切断了普通劳动者直接掌握和理智驾驭现代高端生产工具的可能。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这种所有制圈地改变了剩余价值的榨取形态与资本积累路径。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指出，现代数字平台凭借对基础设施的控制，具有垄断的自然倾向，继而表现出极强的食利性([9], pp. 52~58)。这种食利性在理论上继承并泛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阐明的大土地所有制与地租理论。数智寡头依托对基础设施的绝对垄断，将传统的产业剥削利润，转化为性质更为集中的“数字垄断地租”或“云租金”，实现了对全社会交往和知识生产价值的食利性抽取[10]。由此，原本作为人类解放工具的共同体智力成果，转变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由垄断资本绝对支配的异己力量。

在传统工业的形式规定下，有形的固定资本在闲置或停止操作时往往是静态且内耗的，并不具备主动调用外部活劳动经验以实现自身进化的动机。与之相反，现代人工智能系统则建立在“生产-反馈-再生产”的动态循环网络之中。无论是何种层级的劳动者或普通用户，在每一次调用 AI 大模型、输入提示词指令、展开结对编程，或是调取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其行为轨迹、逻辑习惯与语意倾向都在无意识中被系统转化为宝贵的训练数据。

通过这种递归捕获机制，数智资本在前端维持普惠、便利的智能平台表象，在后端则无偿、饱和地获取了饱含活劳动主体特征的高价值数据资产。资本在前端付出算力成本的同时，在后端完成了对劳动者活劳动能力的隐性萃取。这种死知识对全社会活知识的滚动式吸纳，使异化剥削超越了传统工厂围墙的物理限制，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认知与交往时空都改造成了一个提供无薪数据的“社会工厂”。劳动者在日常实践中创造和更新的一般社会知识，在递归的数据反馈中被资本不断抽空，并客体化为压迫自身的异己力量。

4.2. 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消解：资本规训与认知退化

所有制层面的智慧剥夺，在微观劳动过程中具体转化为对活劳动者实际劳动能力的肢解与消解。这一消解过程首先作用于负责系统迭代的技术与算法工程师(高端脑力无产阶级)。尽管该阶层身处技术前沿且薪资丰厚，但在资本形式规定下其劳动产品的占有权仍旧从属资本，他们是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预言的“发明的职业化”([5], p. 195)的当代代表。资本雇佣工程师的核心职能，是将现代自然科学规律与人类默会知识转化为可编码、可复制的算法代码。在此过程中，工程师的主观创造性面临工具理性的裁剪与肢解——其编写的底层逻辑必须服从资本最大化榨取剩余价值的命令，其阶级本质仍是被剥离了劳动全过程控制权的认知雇佣工人。

这一算法黑箱作为传动轴降临到次级企业与深度用户群体(中间应用实体)身上。由于无力承担底层大模型的研发与算力训练成本,次级企业不得不通过向数字寡头交租的方式接入高级智能系统。作为数智资本扩张的商业中介,这些企业在白领办公、软件开发、文化创意等具体领域中执行技术规训。通过高频度引入智能系统,次级企业进一步推行了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揭示的“去技能化”与“概念和执行分离”的趋势,将宏观的算法逻辑具象化为微观职场内部的数字泰勒主义([11], pp. 47+105)。

微观去技能化趋势的最终受害者,是处于传统雇佣关系执行末梢的常规普通职工(日常雇佣劳动力)。透过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现象学视角,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资料亦可视作一种用具,因其通用性与泛化能力,在日常实践中表现为海德格尔意义上“上手状态”(Zuhandenheit)。当算法响应及时、逻辑顺畅,能够高效输出文案或图表时,用具在主体的操劳活动中就表现得“称手”与“透明”([12], pp. 102~121)。这种透明性赋予劳动者一种“技术赋能”的主体性幻象,使其误以为自己是智能工具的支配者与一般智力的占有者。

然而,器具的透明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代码。由于人工智能系统过于顺手,劳动者在长期的算法驯化与内容饲喂下产生技术依附。原本属于人类主体核心的批判性思考、辩证整合多源信息及前瞻性规划能力,开始被智能机器系统“外在化替代”。“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5], p. 159)人工智能这一新型资本化机器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劳动者“认知退化”与主体性失能。当独立思考功能被算法的工具理性所规训时,人类因习惯依赖人工智能的现成结论与特定价值观,反而丧失了自身内在的超越性和否定性力量,存在退化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的风险([13], p. 339)。虽然当器具产生逻辑幻觉或算法黑箱谬误而显现为“不称手”且“不上手”时,其作为资本压迫工具的敌对特征会显现出来,但在私有制所有权外衣不被触动的形式规定下,这种偶尔的障碍只会被数字寡头以技术升级的名义迅速修复。普通劳动者由于失去了对生产全过程的理智把握,其活的脑力与体力劳动能力在机器的智能化进化中被不断降维与抽空,最终只能在算法黑箱之后亦步亦趋,沦为自动机器体系下“有意识的肢体”。

4.3. 对劳动者阶级地位的影响：技术壁垒与阶层固化

智慧结晶的剥夺与劳动能力的消解,在宏观社会结构中必然表现为阶级关系的重编。在人工智能的生产与再生产周期中,全社会成员依其与数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被系统地重组为具有严密支配阶序的五阶层谱系:盘踞顶端的垄断数字寡头、遭受工具理性裁剪的算法工程师、充当商业传动轴的次级企业、面临认知退化危机的普通职工,以及处于分工边缘的全球数据标记劳工。这种非对称的阶级结构分化,否定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人工智能拉平社会沟壑的“技术普惠”叙事。

这一阶级内部结构的重塑首先体现为数智无产阶级底层的出现。密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的数据标注基地,对应了玛丽·L. 格雷(Mary L. Gray)与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所揭示的“销声匿迹”(Ghost Work)状态。此类劳工在低计件薪酬和缺乏社会保障的雇佣关系中,机械重复着数据清洗、有害信息过滤与语料贴签等基础工作([14], pp. 26~50)。这些隐含于人工智能背后的隐形工人,以高强度的精神损耗与肉体磨损,支撑起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这一分工事实确证了当代智能化生产方式在物质基础上依然依赖于全球无产阶级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吸纳,并将其定格在国际分工体系的最底层。

此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科学演进中,科技巨头通常拥有广泛的专利组合,并通过战略诉讼来捍卫其市场地位,这种行为被称为“第二次圈地”,它成为资本实施技术垄断与阶级固化的有力武器。劳动者若想真正把握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必须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文化资本与系统性科学训练。但在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普通劳动者依旧疲于应对不稳定的生存压力，其时间和精力被高度碎片化，无力跨越数智生产的认知、时间与精力门槛。相反，占有资本与文化特权的认知和技术精英阶级，能够利用其掌控的具身智能及高级仿真技术率先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与财富积累，同时利用算法延展自身的主体力量。广大普通劳工则由于缺乏切身实践的手段，继而只能陷入被过滤、被灌输的“认知囚笼”之中，失去对生产全过程的整体把握。这种技术与资源的不对等形成了一个隐秘的“新知识壁垒”，在全社会范围内固化并加剧了数智时代阶级流动的难度，从结构内部瓦解了劳动者通过活劳动捍卫自身主体地位的现实根基。

5. 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消解劳动者主体地位的重塑路径

作为“一般智力”在当代的资本化形态，人工智能在私人占有制框架下全面升级了资本控制与吸纳劳动的异化机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智能化生产对活劳动主体性的深层剥夺，更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探寻技术向主体社会化复归的治理路径。这就要求彻底超越数智资本的私人所有权逻辑，将其转变为服务于劳动者解放的公有生产资料，这要求在现实中实现劳动者智慧结晶的社会化复归与其劳动能力和阶级地位的重塑，全面铺展人工智能的数智治理路径。

5.1. 劳动者智慧结晶的社会化回归：所有制变革与开源共享

以维尔诺、内格里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虽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提出了极富贡献的创见。然而他们将“一般智力”泛化为脱离机器系统的“大众智能”，企图依靠非物质性的“不合作退出”实现解放。然而，“一般智力”已在现实中客体化为人工智能形态，不触动私有制产权，主观撤离无法动摇资本统治。同时，必须纠正左派加速主义的“自动崩溃论”[1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1], p. 300)人工智能这种机器体系作为资本化了的一般智力，在现实生产中根本上也是与各种形式劳动者敌对的资本形式。因此，治理的出路不在于单纯地一味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而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推动这种资本化的一般智力向社会化复归[15]。

涉及到宏观制度治理层面，应发挥社会主义所有制优势，对数智资本实施制度监管。一方面应完善法律法规与数字平台反垄断审查，彻底根除资本利用算法对数字外卖从业者和零工劳动者进行不平等价值剥削的手段；另一方面应推进“平台合作主义”实验，扶持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共同管理的数字平台与大模型，促进数据收益和智力红利反哺社会整体发展[16]。

值得强调的是，重塑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能仅停留在宏观的所有制愿景上，必须将其细化为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制度抓手。在中观层面，应积极探索“数据信托”(Data Trusts)模式，将数据控制权与所有权适度分离，委托给代表公共利益或劳动者群体的独立信托机构；同时，可研究引入“累进式数据税”等二次分配机制，调节数字垄断资本的超额利得，用于扶持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微观的劳动现场，则须建立健全的“算法审计制度”，对算法运行的评价指标、劳动规训强度及潜在的歧视性偏见进行常态化审查。此外，应积极发挥工会在算法治理中的协同作用，赋予工会组织在平台算法规则制定中的集体谈判权与知情同意权，从技术操作的源头上保障劳动者对自身智慧结晶与数据红利的主体权利。

为打破资本通过知识产权对公共智慧的截流，还必须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源化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的开源机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异曲同工之处，能够调动广大劳动者参与人工智能相关生产的积极性，能有效抑制资本的“发明职业化”与知识垄断。它为劳动者在日常实践中创造、更新和转化社会普遍知识提供了一个真正普惠平等的平台，实现了知识生产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从而将人工智能转化为延伸人类本质力量的社会化一般智力。

5.2. 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重构：认知正义与人机协同

为了实现劳动者劳动结晶的社会化复归，还必须实现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重构。这要求彻底超越数智资本剥削与增殖的私人所有权逻辑，将其转变为服务于社会解放与主体确证的公有化逻辑。在此逻辑转变下，必须以人类的价值理性主导并驯服算法的工具理性，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构建“人机协同、动态建构”的“认知正义”机制，这要求研究者秉持更加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当代的人机关系。人机关系在数智时代并非表现为单纯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对抗，而是一种复杂的、具身化的技术共生状态。人工智能在消解或替代传统劳动技能的同时，也客观上重塑并拓展了新的认知空间与实践场域。因此，重构劳动能力并非意味着让活劳动盲目退回到机器大工业之前的绝对“本真”状态，而是在承认人机深度交融、机器具备一定技术自主性的复杂前提下，确立人机互补的双向适应机制。

在智能化劳动组织中，应改变死知识对活劳动的单向吸纳，确立人机互补的双向机制。一方面，应强化技术工具的辅助性定位，由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承担数据挖掘、程序性脑力劳动加速等非决策性、程序性任务；另一方面，必须巩固人类主体的核心控制权，劳动者须掌握创造性思维、伦理判断与终极确认权，以生产过程“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发生关系，实现主客体的双向良性建构。

在人机实践中，劳动者须克服智能器具因“顺手”与“透明”带来的技术依附。为对抗技术器官外在化导致的认知退化与主体性失能，无产阶级需主动接受系统性的数智素养教育，进而实现对劳动全过程的理智把握，重新掌握自身内在的超越、批判和否定力量。劳动者不能仅止步于作为算法输出的被动接收者和数据燃料，而必须通过积极介入，将人机协同劳动的过程转化为显现人类能动创造力的实践过程，由此促使智能机器体系从资本规训人活劳动的工具复归为确证人类劳动能力与主体地位的延伸器官。

5.3. 对劳动者阶级地位的结构重塑：社会分工重组与政治联合

劳动者智慧结晶的社会化复归与劳动能力重构，关键在于根本性地变革广大劳动者在数智时代数字分工中的阶级地位。为跨越数智资本主义构筑的知识与精力门槛，应当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推行弹性休假制度以及普及全民公共数智素养教育消除因所有制分化导致的新型知识壁垒。同时，应借助材料科学与具身智能的发展，加速用智能机器人替代繁重、高危的程序性体力劳动。这一举措能将底层的数字零工群体与数据标注工从高强度的肉体磨损中解脱出来，逐步消除资本逻辑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带来的阶层分化，为培育高质量的新型现代化劳动者奠定物质基石[8]。

深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数智时代劳动者阶级地位的实质改观必须从根本上依赖无产阶级内部新型政治联合的建立。在当前的阶级结构转型期，无产阶级必须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一般智力化”与“一般智力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双向历史运动。掌握数智工具、操纵符号大模型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应当打破工具理性的心智规训，唤醒阶级意识，同身处线下的传统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建立起新型的政治大联合。

当无产阶级整体占有社会化的智能机器体系与核心大模型的所有权时，社会将迎来财富尺度的根本性变革。新社会的特征在于终结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度量财富的历史，转而以全社会成员能够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真正尺度。在推翻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高阶阶段，人工智能的运行目的将剥离剩余价值的吸纳属性，转为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在这种全新的历史维度下，被迫出卖的谋生劳动让位给人类在艺术、科学、交往等层面的自主个性发展，每个人的智力跃升将直接反过来反哺并推动全社会“一般智力”的无限演进，人工智能这种当代一般智力的对象化产物的发展才能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实现也能够更进一步([5], p. 929)。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张福公.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一般智能与数字平台: 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解读[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7): 70-79.
- [3] Virno, P. (2007)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 3-8. <https://doi.org/10.1163/156920607x225843>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1-98.
- [6] Gartner (2026) Gartner Predicts That by 2030, Performing Inference on an LLM with 1 Trillion Parameters Will Cost GenAI Providers over 90% Less Than in 2025.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6-03-25-gartner-predicts-that-by-2030-performing-inference-on-an-llm-with-1-trillion-parameters-will-cost-genai-providers-over-90-percent-less-than-in-2025>
- [7] 陈俊昆. 人工智能与一般智力的实现[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12): 98-107.
- [8] 申文昊. 基于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重塑人机关系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2025(2): 38-46.
- [9] 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戴宇辰,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10] 黄丹. 技术封建主义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一般智力”问题[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5, 10(3): 50-59+118.
- [11] 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M]. 方生,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3]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14] 玛丽·L.格雷, 西达尔特·苏里. 幽灵工作: 如何阻止硅谷重塑全球底层阶级[M]. 左安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15] 孙乐强. 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4): 10-18+172.
- [16] 陈祉杉, 刘华初. 机器体系“一般智力”视阈下资本逻辑自否性探析[J]. 学术探索, 2026(3): 104-112.